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

“大家丛书”

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GUANG LI DE JIAO YU

杨伯达传

周 珺 著

故宫里的博学家

他是“故宫人”，与故宫有解不开的情缘。他在故宫藏品中寻找历史的线索，在历史文献中探寻藏品背后的秘密。他从一个“半专家”成长为创建中国“古器物学研究王国”的大家，将玉器研究提升至玉学、玉文化的理论高度。50年的古代艺术研究，著述等身；30年的玉器和玉学、玉文化探索，前无古人。他就是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

YANGBODA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

“大家丛书”



杨伯达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周珺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1

(大家丛书)

ISBN 978-7-214-17243-3

I. ①故… II. ①周… III. ①杨伯达—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2016)第 013619 号

书 名 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

著 者 周 珺
责任编辑 金书羽
责任监制 陈晓明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 230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插页 2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7243-3
定 价 2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年少立志	1
1. 没有祖国的孩子	1
2. 去解放区求学	8
3. 留在北平工作	17
第二章 故宫初期	20
1. 故宫前缘	20
2. 中国的骄傲	24
3. “老革命”加“一代宗师”	28
4. 熟读书籍苦钻研	32
5. “下放”农场治好了胃病	42
第三章 博学专家	49
1. 展览陈列专家	50
2. 杂项专家	67
3. 不拘一格识人爱才	85
4. 考察交流不忘研究	93
第四章 黄昏伴玉缘	97
1. “事业型”的家庭	97
2. 离休后的温馨生活	98
3. 以玉会友	99
4. 仗义执言巧点拨	104



第五章 玉文化领军人	107
1. 在故宫结下的玉石缘	107
2. 六十岁专注玉器研究	125
3. 浩瀚玉石, 鉴定辨伪	131
4. 全国文物鉴定中火眼金睛	137
5. 成立全国第一家玉器研究委员会	140
6. 玉器研究的“黄埔军校”	150
7. 笔耕不辍, 著述等身	153
杨伯达主要作品	157
主要参考书目	160

第一章 年少立志

杨伯达说：“我出生在扭曲的社会，是扭曲的时代造就了我独特的性格。”

□ 1. 没有祖国的孩子

杨伯达于1927年12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乳名留栓，原名希善（“伯达”是参加革命后所改）。论杨伯达的出身，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官宦人家，他只是个普通市民家庭里的孩子。和那时众多在旅顺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也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孩子。

杨伯达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说：“我们是生下来的第一天就没有祖国的孩子。当时旅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租借地，实际就是日本殖民地和占领区，而我们这些出生在日本殖民地的孩子被迫接受日本人的奴役教育，天然产生了反日情绪。所以，在这样扭曲的时代培养出的我，表面沉默寡言，实则思想激进。”

杨希善的父亲是山东蓬莱大杨家村人，曾祖父是拥有二百多亩地的富有人家，但是到了爷爷手里，杨家只有三十多亩地。爷爷要养活四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当时土地产量低，



地少人多，生活实在不容易。杨希善的爷爷就让三个儿子出外闯关东。杨希善的父亲和伯父、叔父来到当时被日本人管制的旅顺和大连，定居了下来。不久，杨希善的父亲开了个洋服小作坊，以加工服装为生。杨希善的母亲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没读过什么书，父母就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杨希善身上。

旅顺被沙俄侵占 7 年，遭日本奴役 40 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饱经沧桑，素有“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的说法。日本政府曾经想把旅顺建成日本侵华的前哨和军事基地，并有大量的日本移民过来。杨伯达后来说：“我是旅顺日寇统治下的第一代旅顺人。”

杨希善一家闯关东到了旅顺，被当地人称为“海南丢”；而老家就是旅顺的中国人被称为“此地巴子”；不论是海南丢还是此地巴子，他们都受日本人统治，都是没有祖国的中国人。

杨希善 4 岁的时候，还赶上了世界经济大恐慌。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自美国开始的全球经济大恐慌，也席卷到日本以及中国。当时繁华的旅顺变得萧条，众多商场关门。这一年里父亲失业，为了生活，母亲只得带着杨希善和妹妹回到老家山东，“而且我回到山东得了痢疾”。4 岁的杨希善回到爷爷身边，天天拉肚子。老人看到孙子病成这个样子，听说吃西瓜能治痢疾，专门买西瓜给孙子吃，没想到杨希善的病情更严重了。又有人说得痢疾喝白酒能治好，爷爷就给 4 岁的孙子喝地瓜干酒，这酒也有 40 到 50 的度数，没想到喝白酒真的把小杨希善的痢疾治好了。杨希善 4 岁病好后继续喝酒，这让他练就了一副好酒量。86 岁的他酒量依旧很好，他豪迈地笑道：“就是现在，一般人根本喝不倒我。”

杨希善 4 岁的时候，母亲担心他在玩耍中混沌了智力，

特意送他到村里的私塾，每天读三字经。因为读书，杨希善可以每天从母亲手里拿到两个铜板。这两个铜板可以买一个烧饼，这就是杨希善的午餐。读书就有烧饼可以吃，让小杨希善对私塾读书生活很是期待，他挤在比自己大许多的哥哥姐姐中间，读着枯燥的《三字经》，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一年后，旅顺的经济开始好转，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了父亲身边。杨希善8岁时正式进旅顺公学堂读书。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在旅顺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就是现在旅顺中学的旧址“旅顺公学堂”，这所学校是小学六年制学校。学生所学的语言基本上是日语，教材内容也是按日本文部省规定范围来编制教材，学生从课堂学到的知识和日本学生在国内所学的知识几乎一样。每天早上，不管是日本学生还是中国学生，都要到孔夫子碑前敬礼。小学一到三年级由中国教师教授，由日本老师做班主任。日本制的教学异常严格，这也使得小杨希善培养了很好的读书习惯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对日文的粗通，也让他日后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中可以顺畅无阻地阅读众多日文书籍。这是后话了。

旅顺当时已经有博物馆，学校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参观的旅顺博物馆，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艺术性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列宁街，是日本帝国主义在1905年侵占大连以后，于1916年在沙俄未建成的军官俱乐部基础上改造建成。建筑既有近代欧式风格，又有东方艺术装饰特色。小小年纪的杨希善早早便接触了在当时很现代的博物馆，当他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馆内的珍品时，却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和博物馆紧紧联系在一起。

旅顺是军事要塞，小小的城市有海港和机场，聚集了日本的海陆空三军，日本曾派出中将来管理这座城市。可见这



座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城市对日本人来说多么重要，在旅顺的中国人的生活又是多么压抑。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因为经济衰退、物资匮乏，对旅顺施行食品配给制，被奴役的民众更是哀声四起。杨希善就生活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里，成长在扭曲的时代里。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中，杨希善的思想却与之完全对立，他的内心一直拒绝做日本顺民，并且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但是中国那么大，为什么会那么贫穷，有那么多饥饿的人，为什么就打不过小小的日本呢？作为中国人，他思考的都是这些问题。“作为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杨希善内心一片迷茫。

就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杨希善的父亲身染重病，卧床不起，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年光景后病逝。杨希善的伯父和叔叔们也因为各种原因前后得病去世。大连的四叔回到山东，悄悄加入了共产党，在收集情报的过程中身份暴露，被日本人枪毙在村子外。杨家父辈相继去世，家道衰落，家庭重任落在了杨希善身上。当年杨希善才15岁，正在就读旅顺高等工学校。在痛苦的环境中，杨希善又遭遇家变，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生活的希望来自哪里。面对体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他不知道自己靠什么谋生，更不知道如何支撑起这个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家，只感觉四周一片黑暗。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后期，日本经济环境更加恶劣，在旅顺这样的日租地，人民生活得更加悲惨。日本人连孩子都不放过，当时学生在假期必须参加劳动。大热天里，杨希善和同学一起整修机场，结果得了一场大病。毕业那年，所有学生必须去炼钢厂劳动。这时候，连日本老师都感觉到坚守旅顺的时间不会太久，学生更是处于饥饿和绝望的边缘。杨希善偶尔逛书店，看到一本讲述苏联的书，才知道这世界还有个不同

于日本的新国家。杨希善还从日本女职员处借到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看得似懂非懂。

杨希善虽然接触了这些共产主义的革命火花，但尚不清楚这些革命火种已经在全国各地悄悄点燃，倒是身处的环境对他触动更大。当时他在耐火材料厂劳动，发现在此工作的中国人大多是山东人，因为是老乡，大家聊得比较多。日本人对这些中国工人完全是奴隶制管理。所有工人进出工厂都要被搜身，不允许带走任何一件工具；大冬天，这些工人衣衫褴褛，吃着难以下咽的高粱窝窝。杨伯达回忆起往事：“你们肯定是没见过这种黑色窝窝，就是丢在地上，让人以为是一团屎。”让杨希善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13岁的劳工，大冬天就穿一件破棉袄，连内衣都没有，肘子上都露出了破棉絮，“真是可怜呀，这就是没有祖国的少年，不仅不能受教育，还要做童工”。

杨伯达回忆道：“1944年秋天，旅顺所有学校的学生被拉到大连甘井子的大华矿业公司里去做劳工。我亲眼目睹了日本的监工对我们中国工人打、骂、虐待。我心里非常愤恨。有一次看见一个监工在打一位13岁的童工，我忍无可忍，上前拦住监工，当时我说话的口气非常威严，也许是被我的神情震撼，这位监工真的没再打这个少年。第二天，这个少年的哥哥特意跑来感谢我。我这样阻止监工，我们这些学生谁也没有去打小报告。当时我是走读生，听说住寝室的同学们也在和日本舍监悄悄作斗争。想想大家在这个环境里勉强生活下去，还有什么前途？每天的所闻所见，让我都气得胸胀胀的，非常郁闷。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非离开不可。”

中学毕业后，杨希善想到自己如此家境，加上旅顺经济



环境恶劣，上大学是不可能了，但是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关东州。北边的“满洲国”是绝对不去的，所以学校分配时，杨希善选择了进关，去华北地区。他避开了军事方面的矿业和铁道，选择了棉产业，结果工作不到四个月，日本投降，公司关闭，他们这批学生又一次面临选择。当时有同学邀请他去泰安老家小住，杨希善怀着百无聊赖的心情，便跟着同去。1945年，杨希善正值18岁，他和众多有为青年一样，冲破白色恐怖，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杨希善居住在山东泰安津浦线西侧，正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冀鲁豫行署泰西区。



少年时期的杨希善

在日租地旅顺时，杨希善经常从老家亲戚那里听到八路军的消息，八路军经常在敌后英勇奋战、收复失地。杨希善的四叔父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被伪军残酷杀害，留下四婶带着儿子艰难度日，国恨家仇使他对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十分痛恨。杨希善意识到在抗日的是八路军，而国军则节节败退。在日本人的广播里也经常播报八路军的消息，他听到新闻里的刘伯承死了好几回，当时经常报道的还有海南岛的游击司令冯伯驹，也是不断传出被打死的消息。他们俨然已经成为杨希善心中打不死的神人。日本投降后，旅顺回到祖国的怀抱，杨希善在山东济南看到进城的国军歪戴帽子、枪支落后、蓬头垢面、队伍跑得纷乱，心想这绝对不是能打赢日本人的部队，而当时的八路军，一律两尺半的灰色棉衣，精神振奋，士气完全不一样。

杨希善在两种政治力量的抗争中自然就选择了八路军，在党组织动员后，杨希善决定参与宣传工作，他对教员说：“让我反蒋没问题。我是个外地人，口音那么重，参加宣传活动，不适合讲演，但是我会绘画，让我画壁画吧。”很快，杨希善的绘画技术就展露出来。他就读的学校很重视美术教育，教师是日本东京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杨希善也擅长绘画。组织上经常请他创作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军队的宣传画。杨希善拿着画笔，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有一次，杨希善在泰安火车站的书摊买了本《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本书给杨希善很大的启发。这不正是从沦陷区屈辱生活中走出来的热血青年日夜追寻的光明前途吗？勤于思考的杨希善受到《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这部革命书籍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那时，东牛村中心小学的刘校长也常对杨希善讲些革命思想，其中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等民主建国纲领使杨希善深受鼓舞。

除了做革命宣传工作之外，杨希善还在县政府的泰安简易师范学校做高小6年级老师兼班主任工作。此时担任国文的潘老师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杨伯达。当时他问杨希善家中排行老几，杨希善说是老大。他深思片刻，便说：“那你就叫伯达吧。”当时老师根本不知道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有位在“文革”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陈伯达，也因为这个“伯达”，他才在“文革”中躲过一劫。这又是后话。

这时候，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英文系的王同志来县政府办事，这位济南市政府驻泰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认识杨伯达后，便说：“你应该去山东大学去改造思想。”

杨伯达原本就想找机会学习，作为沦陷区成长的青年，



他最渴望接受革命思想。杨伯达就向泰西县政府教育局长要求去山东大学读书,这个要求很快便被批准。于是,杨伯达在革命解放区展开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求学生涯。

□ 2. 去解放区求学

杨伯达在解放区四年的求学生活,犹如游击状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信仰让杨伯达在生命最晦暗的时期始终充满希望。

1946年,杨伯达苦于自己的业务水平不足,难于更好地开展工作,于是向泰西县领导请求到山东大学学习。泰安县领导热情支持,很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要求。杨伯达带着组织机关介绍信及粮票,兴高采烈地去当时位于临沂泰西的山东大学报到。

当时的战争形势变化不定。途中,杨伯达向两位战士问路,这两位战士惊诧地说:“同志呀,临沂已是一座空城,部队撤退,学校也都转移了。”杨伯达心急如焚,忙问转移到了哪里,战士指着东北方向说:“你往滨海区赶吧。”心情急迫的杨伯达日夜兼程,一路疾走,赶到滨海区,才找到当时的山东大学。

杨伯达到了解放区大学,感觉找到了家,立刻投入到政治理论和业务的学习中,但是这种家的感觉很快就被打碎了。因为战争的原因、区域的转变和大学的合并,自1946年,杨伯达的大学生涯一直处于游走的状态。国内打了四年的解放战争,他这四年一直是游走式的求学,且念了四所大

学。他的第一所大学是临沂山东大学；第二所是华中建设大学的文艺系，解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的黎冰鸿先生当时是他的老师；第三所是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不久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也随之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是杨伯达又念了他大学生涯里的最后一所大学——华北大学美术系。

1947年，党中央放弃延安，国民党大造声势，气焰嚣张，北平街头写满反动标语，似乎共产党“灭亡”在即了。延安失守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斗志和热情，使得更多人奋起投身革命的洪流。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大量知识青年纷纷奔向各解放区的高潮，晋察冀张家口的华北联大、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东北的鲁艺、山东的建设大学等都是当时革命青年日夜向往的中心。

在山东，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发展，杨伯达和其他知识青年一起辗转至华中建设大学的文艺系学习，受教于黎冰鸿、刘汝礼等美术家。

华中建设大学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组建的一所解放区大学，地址在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北，时称苏中地区。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学校从苏中迁至苏北，再迁至鲁南、鲁中，最后迁至胶东半岛上的海阳县。华中建设大学的校长李亚农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作家、历史学家，副校长夏征农也是学者名流，曾是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两位校长社会影响很大。学校教师阵容整齐，不乏名人学者。杨伯达在建设大学学习美术，美术老师是留法的黎冰鸿，黎冰鸿美术功底深厚，经常创作革命宣传画，让学生临摹、放大。杨伯达对黎先生的美术造诣非常佩服，师生的私交也是甚好。黎先生为了进解放区不惜离婚，当时带着儿子来华中建设大学教书，



有次小孩生病，老师很信任杨伯达，派他领着自己的孩子出城去看医生。

杨伯达回忆起在解放区大学读书的经历，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延安文艺座谈讲话的学习。

当年转入华中建设大学，杨伯达学习的第一课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堂课上了一个月，各位学生积极发言，讨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理论。当时华中建设大学生的成分复杂，有国民党起义的同学，也有话剧演员、戏专学生和山东大学转校而来的同学，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致同意这个理念。杨伯达的世界观也由此渐渐确立。对杨伯达而言，从敌占区到解放区，从市民生活到战争生活，这是他脱胎换骨的过程，也是他思想的根本转变阶段。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月里，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又为文艺是否为小资产阶级服务展开了讨论。这些同学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对杨伯达而言则不存在这个分歧，他说：“我出生在日本奴役压制下，没有民主和自由，很容易接受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个观点。因为历史就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在讨论中，大家思路也渐渐清晰。在对古代文化遗产继承定义时，得出了继承精华、去其糟粕的结论。这也让杨伯达在以后研究古代艺术以及研究玉学时有了一把思想的尺子。

对于什么是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这也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杨伯达说：“文化遗产的精华确定是个长期研究的过程，这要对具体文物具体分析。”

杨伯达的这段学习时期正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艰难阶段。国民党在青岛集结军队，准备打通烟台到潍坊的公路，封锁胶东半岛，想一网打尽在胶东的十万中共党员干部。1947年

胶东保卫战时，形势紧张，学校再次疏散转移。党为了保护这些学者，当时建设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班主任以及黎冰鸿等教授被秘密转移，学校一夜之间就不见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学校决定杨伯达和其他几位同学转移到山东省文登县，在文登县一位女同学家里隐蔽起来。但是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组织，大家心里总是空荡荡，同学们都待不下去，有的准备回家乡，有的想返校。其中一位女同学李健多年后回忆，当时为了大家的安全，杨伯达建议经石岛乘船去东北解放区，没想到大家一致赞同。

石岛是胶东的最东边，几位同学到了石岛，遇到石岛的同学，才知石岛已经封船了，前一时期去东北的船队还被敌人打沉了。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愣住了，闷闷不乐地待在那里一声不吭，看来通过石岛去华北解放区的计划是行不通了。住在石岛的同学专门为大家做了饺子，没想到同学们想到前途暗淡、战火将至，便胃口大减，吃得无滋无味。细心的杨伯达一眼看出大家的心事，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丧气，杨伯达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会有办法的。现在建设大学本部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回到华中地区，我们一无所知，更无法找到他们，这次东进不行，可以西移，越过国民党烟潍路封锁线转移到渤海惠民去山东大学。”同学们听后，茅塞顿开，各个眉开眼笑，所有的忧虑一扫而空，一大盘饺子顿时吃得精光。虽然通过敌占区有很大的危险，但是这些青年人不能坐以待毙。大家分析了下，当时还是9月，敌人还在向胶东进犯，同学们必须尽快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去寻找革命同志。这件事情虽然冒险，但是很有希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20岁的杨伯达能够独辟蹊径，想出如此大胆的对策，已经充分展示他具有艺术家的大胆想象力，更拥有革命家的顽



强毅力和踏实的实践精神。

大家统一了思想，就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将各种有关证件缝在棉衣的夹缝里，开始向烟滩路封锁线进军。一路上杨伯达细心照顾着同行的女同学，不断鼓励大家。当时杨伯达风华正茂，大个、方脸、大背头，挺帅气，一路上不时招来过往行人的注目。大家一路上跋山涉水，但是情绪高涨，充满了信心。此时杨伯达倡议：“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可以趁天黑马上过封锁线，这样也有利于掩护我们自己。”

当晚是个阴天，没有月亮，没有星光，四处一片漆黑，连路都看不清楚。此时，大家遇到文艺系的行军队伍，便汇合在一起，准备过封锁线。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大路，也不过村庄。同学们走在两行树丛中间干涸的砂子河床上，连大气也不敢出，可是脚下的砂子却发出声响。杨伯达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带领大家前进。不知谁突然一声尖叫，吓得大家伏在地上，这时对方也发现了杨伯达等人，也躲在树丛中不动了。此时有位同学是军人出身，带了两枚手榴弹，大着胆子迎了上去，相距几十米才发现对方是民兵。幸好是场虚惊，大家在民兵的带领下，在黎明之前顺利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当时是秋天，路上秋雨绵绵，时大时小，路又滑湿，晚上更是把人冻得瑟瑟发抖。千里之行刚过半，大家脚底就磨出了血泡，腿也走肿了，双手胀得握不起来。大家忍着疼痛，坚持着，除了睡觉吃饭，将所有时间都用来赶路。此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早日到达渤海惠民，找到组织，返回山东大学。开始这个队伍还有位男生，不久这位男生就与大家分手，杨伯达成为队伍中唯一的男生。他带领大家前进，管理行程中的一切事务，还要照顾好两位体弱的女生。杨伯达作